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
第56期（民國96年6月），143-192
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後現代思潮下中國現代史學的走向*

汪榮祖**

摘 要

中國史學與西洋史學一樣源遠流長，卻在西洋史學的啓示與影響之下進入「現代」，並一直追隨西方史學的理論與方法，尤以蘭克的史學方法為依歸。至「後現代」風潮興起，其理論雖然繁多，未有定論，但其基本傾向主要在挑戰、甚至否定「現代」；其理論對現代史學的顛覆性尤其巨大，吾人所知的現代史學幾乎被顛覆殆盡。長隨西方的中國現代史學遇此「巨變」，有如「夢魘」，不僅是西方現代史學「高貴夢想」之破滅，使中國現代史學頓失依據；而且呈現中國現代史學一直未能建立「自主性」的尷尬。不過，後現代風潮雖具破壞性，但從最近的發展看，對欣欣向榮的新文化史研究已有正面的貢獻。中國現代史學自當繼續參照西方的治史理論與方法，但宜建立自主性，而不宜尾隨，大可於借鏡之餘，重新思考中國傳統史學，走出自己的路。

關鍵詞：中國現代史學、西洋現代史學、後現代思潮、新文化史

---

* 收稿日期：2006年6月9日，通過刊登日期：2007年5月3日。
**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

導 論

史學素稱是一門古老的學問，但史學進入「現代」(modern)，不到二百年。中國史學與西洋史學一樣源遠流長，卻在西洋史學的啓示與影響之下進入「現代」，並一直追隨西方史學的理論與方法。至「後現代」風潮興起，其理論雖然繁多，未有定論，但其基本傾向主要在挑戰、甚至否定「現代」；其理論對史學的顛覆性尤其巨大，吾人所知的現代史學幾乎被顛覆殆盡。長隨西方的中國現代史學遇此「巨變」，有如「夢魘」，不僅是西方現代史學「高貴夢想」之破滅，使中國現代史學頓失依據；而且呈現中國現代史學一直未能建立「自主性」的尷尬，以致於徬徨失措。不過，「夢魘」之震撼或能起「驚醒」作用，使中國現代史學不再尾隨西方，而是參照西方，走出自己的路。

西洋史學最先進入「現代」，並非偶然，而是有整個現代化爲背景：西方於十六世紀形成現代民族國家，十七世紀發動科學革命，以及於十八世紀產生工業革命。史學則於十九世紀的西歐開始「現代化」，開史學在大學裡安身立命之風氣，史學工作者有其固定的職業，成爲獨立自主的學科，奠定史學教學與研究的制度。回顧現代史學之昌明光大，大致根據三個基礎：「學院化」、「專業化」與「獨立化」。學院使歷史研究人才與文獻資料能夠集中，而不再爲政教服務，或成爲貴族之餘興。學院化自然促進專業化，使歷史研究由專人負責，歷史寫作成爲精細的科學報告，不再是教訓式、空談式、或純描繪的敘事。學院化與專業化之後，歷史學逐漸成爲嚴密而精緻之學問，隨著現代學術獨立潮流，以及客觀原則之要求，逐步擺脫非學術因素的干擾，尤其是政治因素的干擾，乃成獨立自主的學問。[1]

德國史家蘭克(Leopold von Ranke)在上述三個基礎的條件下，出任柏林大學講座，建立史學「研討班」(seminar)，大開依據檔案資料研究歷史之風，國

1 汪榮祖，〈五四與民國史學的發展〉，收入汪榮祖編，《五四研究論文集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79），頁 221。

內外學子聞風向慕，被公認爲「現代史學之父」。[2]中國現代史學自二十世紀之初以來，無論在史觀上、史學方法上，以及歷史書寫上，也多追隨西方。西方現代史學之父蘭克的史學雖僅爲極少數中國學者所熟知，然其史學方法卻影響甚大，舉凡依據檔案資料書寫歷史，實證求真，書寫如過去所發生的等等，在精神上與方法上，都與實事求是的乾嘉樸學頗能切合，而留德的姚從吾從早年在北大到晚年在台大所講授的史學方法，無非是以蘭克爲主的德國語文考證觀點。毫無疑問，現代西方實證主義的史學方法對中國現代史學之影響既深且遠。

現代西方實證主義史學曾被誤解爲科學的歷史，以爲歷史可能建設得像自然科學一樣的精確。1930 年代的「歷史相對主義」(historical relativism)不僅挑戰科學的歷史之不可能，而且強調歷史不可能有絕對的真相，每一位史家都可以寫他自己的歷史，儘管如此，至少仍有相對的真相。至現代社會科學大盛，史學之社會科學化爲史學求真提供另類可能性。然而當史學書寫淪爲社會科學報告書時，又迫使史學回到「基本面」，重彈歷史敘事之必要，而敘事仍須扎根於社會科學的研究基礎之上。現代史學雖在理論上、風格上、方法上，以及書寫上不時有所變化，但實證主義的基調並未動搖。直到 1980 年代湧現的後現代風潮，始徹底否定實證主義史學，否認客觀過去重現之可能，認爲歷史僅僅是史家主觀的作品，與文學作品並無二致。難怪畢生致力於史學方法與史學史的杜維運教授感到「駭人聽聞」，斥之爲「大放厥詞」。[3]杜門弟子黃進興痛感後現代史學旨在「往事不可追憶」，花了三年時間研究後學源流，分述其代表人物，然後加以品評，以便「攔截」。[4]黃氏更擔心中國史學不久將「不幸」進入後現代風潮，有云「不知在明日過後(the day after tomorrow)，新廈即可落成，或只遺留斷瓦殘垣呢？吾人則可拭目以待。」[5]黃氏所拭目以待的顯然不是「新廈落成」，而是「斷瓦殘垣」。一葉知秋，可見後現代主義的歷史

2 參閱汪榮祖，《史學九章》（台北：麥田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 49-70。

3 杜維運，〈後現代主義的弔詭〉，《漢學研究通訊》，卷 21 期 1〔總 81 期（2002 年 2 月）〕，頁 2。

4 黃進興，《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，2006），頁 1、38-44、80-88、156-162。

5 黃進興，《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》，頁 222。

觀對中國現代史學而言，不啻是一場「夢魘」。

不過，西諺有云：「每一朵雲都有其銀邊」(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)，所謂「禍中有福」者也；具有顛覆性的後現代理論，也顛覆了西方文化中心論，以「小寫歷史」(histories)替代「大寫歷史」(History)，中國文化與史學在「小寫歷史」中自有其一席之地。事實上，文化多元與「地方性」成為新文化史的大勢所趨。中國現代史學或可藉新文化史的觀點和方法重建獨立自主的史學。

中國現代史學之興

中國史學開始現代化早在現代學術制度建立之前，現代大學要到戊戌變法那年(1898)才有，即所謂京師大學堂，民國以後經蔡元培的改革，逐漸走向「三化」。經史逐漸分途，史學成為獨立的學門，並在大學裡建立專業的學門，作為最高學府的北京大學首開「史學門」。晚清派遣的留學生帶回新概念、新方法，老師宿儒在現代學院環境裡，無論在教學與研究上，也與傳統學風漸行漸遠。[6]自此，中國現代史學之走向，遂與得「現代」風氣之先的西洋現代史學，難以切割。

在學院學科建立之前，在歐風美雨衝擊之下，梁啓超與章太炎於世紀之初，間接從日本引進西方進化論史觀，影響到對整個中國史的看法。梁啓超首先打出「新史學」的旗號，然梁氏之新史學並非舊史學的「變法維新」，而是嚴厲譴責傳統史學，幾乎將之全盤否定。直到梁氏晚年執教清華之後，成為學院中人，才奠定中國現代史學方法論的基礎，但其方法基本上轉借自西方。

在五四之前，史學之學院化仍不如國文與外文兩學科之獨立與自主，甚至仍將「歷史」附屬於「國學」。北京大學建立史學門之後，其課程建置完全仿效西洋上古、中古、與近世的分期方式，唯課程內容尚未如當時西方之專業化，如教上古史的陳煥章仍是舊時代的通儒，尚非現代史學專家，既無明確的史學

6 參閱陳以愛，《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》（江西：江西教育出版社，2002）。

範疇，也無信史觀念；教中國中古史的戴錫章也是國學家，亦非專業的史學家。教近世史的楊棟林主要講故事，也無專業之可言。西洋史課程雖由庚子事變後留學東西洋之「新學之徒」教授，但並不一定是史學專業。比較專業的課程有葉涵的藝術史與李大釗的史學史。[7]所以，已經學院化的中國史學在民國 8 年五四運動之前，基本上仍然沒有專業與獨立自主可言。[8]五四之後，新史學隨新文化而蓬勃發展，出現以整理國故爲焦點的史學運動，以及史學專業期刊；整體而言，中國現代史學在觀點上以及方法上一直仰賴西方史學。

梁啓超於二十世紀之初所提出的「新史學」，就是針對中國傳統舊史學而發的現代史學宣言。他在西學的影響下，以現代民族國家史批判帝國史爲「帝王家譜」，以演化論批判傳統史觀之停滯，對於中國傳統史學的「合理性」破壞甚大。[9]五四之後，中國的現代史學通過西式學院與學科的建立，更日趨西化，無論在方法上或理論上，唯西法是從。晚清學堂之初設，原意中西兼重；張之洞草擬〈奏定學堂章程〉，並於其《勸學篇》一書中言及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，此話原意在循序漸進，學西學之前先把中學學好，才不致於忘本。不過，張之洞的體用說常被扭曲爲「牛體馬用」，糾纏不已，遂成中西學對立之勢，維護中學被認爲是提倡西學之障礙，故非去中學不足以興西學。新學堂無論在課程的內容或安排上，也愈來愈成爲洋學堂的翻版，滿清學部於 1906 年已感受到「大率皆喜新厭故，相習成風，駸駸乎有荒經蔑古之患」。[10]民國以後，學堂更名副其實地定型爲洋學堂，歷史教育與歷史書寫亦刻意仿照西方。

民國元年明定大學分爲文、理、法、商、醫、農、工七門學科，已完全仿效西方學制，傳統學問成爲洋科系研究的材料，不再是獨立的學門，經學在舊時代雖然列爲諸學之首，但在新學堂已被肢解，分屬各學科，甚至被消滅於無形。五四之後，北大中國史學門易名爲史學系，正式與西方歷史教育制度接軌，

7 據當年北京大學史學系學生夏德儀的回憶，夏先生爲前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。
8 汪榮祖，〈五四與民國史學的發展〉，收入《五四研究論文集》，頁 225-226。
9 參閱汪榮祖，〈論梁啓超史學的前後期〉，《文史哲》，2004 年第 1 期，頁 20-29。
10 見潘懋元、劉海峰主編，《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——高等教育》（上海：教育出版社，1993），頁 40-41。

開拓西洋史課程，並漸以講授西洋史的方法來講授中國史。太炎弟子朱希祖出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，即欲以「歐美新史學，改革中國舊史學」；[11]事實上是取代而非改革，因所欲優爲者，乃積極學習歐美新史學，未暇對中國舊史學做深刻的反思與檢討，往往簡單地以新汰舊爲要務。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系於 1917 年由美國留學回來的何炳松任主任，創辦《史地學刊》，大力介紹美國的「新史學」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系則於五四之後創辦《史地學報》，也成爲宣傳和譯介西方現代史學的重鎮。北京、南京之外，其他各地的新式學校亦莫不以西方史學爲現代史學的指標，但「宣傳」與「譯介」終不免流於「形式主義」(formalism)，游談無根，並不能就此建設中國現代史學的理論體系。

中國現代史學的科學化

中國現代史學特別強調史料的重要性，其實也是在響應西方現代史學之父蘭克實證學派的方法論。蘭克寫有史學專著約六十部，久無一部完整地譯爲中文，其著作也不爲現代中國史家所熟悉；蘭克對現代中國史家的影響主要在史學方法論，其方法論對五四以後的中國史學界影響很大，但最大的誤解則是將其方法論等同科學方法。[12]蘭克所謂的科學方法，無非重視原手史料，重視檔案，實證求真，認爲凡無直接證據者皆不可信。歷史求真引發以顧頡剛爲首的疑古風潮，對中國古史表示極端的不信任與否定，直至晚近中國才走出「疑古時代」。[13]

顧氏於疑古之餘，藉此提倡西方人所謂的信史，而信史之建立必須根據可靠之原手檔案史料，遂引發傅斯年「史學即史料學」之說。傅說的實質意義是建立科學的史學，若無充分可信的史料，根本談不上重建史事，提出解釋，或

[11] 轉引自劉龍心，《學術與制度：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》(台北：遠流出版公司，2002)，頁 136。

[12] 有關論證，詳閱汪榮祖，《史學九章》，頁 63-65；同書(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6)，頁 30-32。

[13] 見李學勤，《走出疑古時代》(瀋陽：遼寧大學出版社，1997)。

建立史觀，所以必須在信而可徵的史料基礎上書寫歷史，才會像生物學、地質學根據可靠的原料立說一樣地具有科學性。而民初考古的豐收，特別是殷墟甲骨等實物之出土，更加強了重建科學信史的信心。近人往往誤將傅斯年歸於重視與處理史料的所謂「史料學派」，[14]其實傅氏是「科學派」，他想要以充分的史料來建設科學的歷史，故自英國回國途中，即已致書史家顧頡剛，以「牛頓之在力學，達爾文之在生物學」[15]相勉。力學（即物理學）與生物學都屬於自然科學。

蘭克的史學方法論著意於「不以今論古」，即留德並終生宣揚蘭克史學方法論的姚從吾所總結的「以漢還漢，以唐還唐」。類此重建歷史真相、辨僞考證、重視檔案文獻的啓示，很容易爲自傳統過渡到現代的中國史家所心領神會，因與實事求是的乾嘉考據學風頗能契合。蘭克以文字學考辨史料的原則，在西方固然是一重要的突破，[16]然而中國傳統樸學家早就以小學（即文字學）解經治史，並強調「讀書必先識字」的原則，所謂識字也就是在文字上下功夫。所以近百年來，中國現代史學的主要成就不在借鏡蘭克史學書寫的風格，而在於呼應蘭克的治史方法。

在中國現代史學史上卓有貢獻的歷史學家，幾乎莫不重視一手史料與史事考證，而且在這一方面的成就最大。史家孟森鉤沉爬梳，從史料中考定清室的先世、滿洲名稱的由來、八旗制度的性質，以及釐清清初諸多疑案，諸如太后下嫁多爾袞、順治帝出家、雍正奪嫡等等。孟森所謂「以異代訂定史事虛實」，[17]無不在回應西方實證史家追求歷史上的客觀真相。又如史家陳垣之重視史料之抄本、刻本，以及糾謬正誤，無論在校勘學、目錄學、版本學、年代學以及史諱學上的奠基工作，也莫不爲了增強求真的工具。他的研究重點在宗教史，最大的成就也在釐清客觀真相，例如考定開封的猶太族群，在元朝以前並無記

---

14 例如許冠三，《新史學九十年》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86）一書第七章所論。

15 見傅斯年，《傅斯年選集》（台北：文星書店，1967），冊 3，頁 408。

16 見 Richard J. Evans, *In Defense of History* (New Yrok: Norton, 1999), p. 16.

17 孟森，《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》（石家莊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 167。